

画家的藏画:谁是谁的热爱?(上)

◆ 曾焱

从弗洛伊德开始

放在中国绘画史里,其实“画家之画”这种话题没有多么特别。以中国文人传统,艺术鉴赏从来讲究私藏和私赏,除去拜师,递藏是习得书画和精进技艺的重要途径。“雅集”就是古代文人常见的聚会形式,尤其北宋李公麟绘画,米芾题记的“西园雅集”,成为后来历代画家摹绘的母题。雅集主人多为书画大家或文坛领袖,选个合意的日子,将同门好友召集到宅第花园,摆酒吟诗,谈书画。主人手里若是没有几件值得观赏的收藏,怎能应付得来这样的场面?所以大画家兼为大藏家,或藏而优则画,在中国古代都很寻常。研究中国文人书画风格,也要论及他们的收藏脉络。

但在西方,画家和宗教在早期形成的供养关系,教堂在艺术传播中充当的公共空间的角色,以及18世纪开始萌生的博物馆公共收藏体制,都使得西方画家和他们的个人收藏之间没有那么显性的关系,相关记述多见于艺术家传记或者个人展览资料中,而很少有像伦敦国家画廊这次的《画家之画》,以倒叙索引的艺术史研究方式——从20世纪的弗洛伊德、马蒂斯,一路回看到19世纪末的德加,19世纪中期的莱顿、沃茨和劳伦斯,18世纪的雷诺兹,以及17世纪的凡·代克——通过八位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画家的个人眼光,将欧洲绘画在近三个世纪的变化线索呈现出来。

展览开篇是英国画家卢西安·弗洛伊德的藏画。他死于2011年,生前提出将自己收藏了10年的柯罗画作《意大利女人》交给伦敦国家画廊保存。弗洛伊德有不少名画收藏,但这幅本身肖像《意大利女人》无疑是展览中最迷人的一幅。馆长加布里埃尔·费纳尔迪透露,《画家之画》展览的想法其实就源于弗洛伊德的这一捐赠:当国家画廊在2012年最终迎来《意大利女人》入馆的时候,目睹原作的人都惊叹它的不同凡响。柯

当一位大画家倾心去拥有另一位画家的作品,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他们的收藏和博物馆、画廊的收藏有什么不同?谁是谁的热爱?谁又几乎是所有画家的热爱?他们自己的绘画风格在多大程度上受其藏画的影响?

伦敦国家画廊的大展《画家之画:从弗洛伊德到凡·代克》6月底开幕,这是2016年早就令人有所期待的一个展览,国家画廊据称为它策划和准备了4年时间。80多件作品中,既有他们压箱底的馆藏,也有从其他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手中借来的宝贝,有画作甚至说是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20年之久。



■ 弗洛伊德收藏的柯罗作品

罗通常被认为是法国18世纪枫丹白露画派的代表,收藏家都渴慕他的风景画,但弗洛伊德的这件收藏却让人看到,柯罗的人物也如此简朴而完美。弗洛伊德是在2001年一场拍卖会上买下它,《意大利女人》回家后,弗洛伊德将它摆放在他顶楼的休息室里,和奥尔巴赫的画、德加的雕塑相对,他每天躺在床上都能看到它。

“对于画家而言,拥有一件画作,意味着最深层次地与之相处,并在过程中发生一种亲密的、极其强烈的创造性对话。”策展人安娜·罗宾斯于是想到要做一次盘点,看看在全部馆藏里有多少画作是像《意大利女人》一样,入馆前属于画家们的私人收藏,或由画家推荐购藏。这份清单出来后是令人惊讶的,竟有70多幅,其中多数数为大师拥有。

狂热的德加

展出的8个“画家之画”,最狂热的收藏者大概要数印象派德加。馆藏中至少有14件德加的私人藏画,这还不包括他生前一直留在手中不愿出售的7幅自己的画作。这批借

藏几乎全部来自1918年巴黎的一场拍卖——在德加去世后一年,他的收藏就被人送到了拍卖行。

与德加藏画一起陈列的,还有老照片,拍摄的是当年他家起居室的陈设。德加的购藏主要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从那些挂在墙上、每天围绕着他的画作来看,德加的品位很高、视野比较宽阔:除了几件早期古典大师作品,他偏爱的显然是19世纪上半叶的大师杰作,比如安格罗和德拉克罗瓦,虽然一个新古典主义,一个浪漫主义,风格相差甚远。

对同时代人的画作,他偏爱马奈和塞尚。他也买了很多其他印象派画作,但我们可以理解为在热爱之外,也有情谊的因素。在印象派团体中,德加会参加一些咖啡馆聚会,但和其他画家的生活交集并不多,因为阶层差距太大。他出身富裕,一向衣食无虞,不需卖画为生。他不算外光派,对风景和光线兴趣寥寥,所以也较少和其他画家一起去巴黎郊区或法国南部写生。但他对依靠卖画生活和创作的朋友都尽力帮衬,尤其是对比自己年轻的画家,方式就是在他们最困窘的时刻,买他

唐山抗震救灾亲历记

游玉云



6. 教导员

值班员手捂左肩,向战友们传达了李师长的紧急命令,随即跳进调度室寻找通讯资料。他东扒西挖找出了指挥密码,在砸坏的写字台旁,寻到了通讯资料,如获至宝地跳了出来,战友们迎上去扶住了他。大家核对所有抢出来的资料,发现导航资料还在调度室里,就争着要去寻找。值班员推开众人:“那些资料我知道在何处。”说罢,他第三次跳入令人生畏的调度室。

5时50分,唐山机场直接向北京发出了第一份特急电报:“唐山地震,灾情严重!”5时55分,李师长决定:里—2型飞机飞往北京;派飞行团政委和师部张参谋乘机到北京向中央报告灾情;运—5型飞机上的短波电台作为临时对空联络通讯工具。6时01分,值班员起草的报告灾情和唐山机场可以接受飞机降落的紧急电报,由短波电台报务员发向了北京。6时12分,唐山市救灾指挥部的代表和受灾群众代表要求唐山机场的飞机火速飞往北京。6时30分,唐山气象台的同志对唐山上空复杂而恶劣的气象作出了极有参考价值的预报。6时42分,值班员在塔台车上果断地发出了口令:“x号注意!可以起飞!”6时51分,天上万物仍在颤抖,天上狂风夹着暴雨席卷而下,成千上万的受灾群众挥洒热泪,世界上罕见的大地震发生后的3小时09分,唐山第一架背负人民祈望的飞机升上了天空。7时40分,这架飞机穿云破雾49分钟安全地降落北京机场。7月28日早晨8时正,从首都北京来的第一架飞机飞抵唐山上空。两分钟以后,这架载着中央极其关怀之意的飞机安全着陆唐山机场。

子夜时分,天阴森森的令人毛骨悚然。雪亮的车灯下,碎砖瓦砾遍地,崎岖的道路一会儿宽得奇怪,一会儿窄得可怕,偶尔有门板、窗框、房架冒出来挡驾。我们的炮车蹦蹦跳跳地向唐山市钓鱼台方向挺进。临时编成的车队,六辆一组,互相紧紧跟

着,谨防掉队。这当儿,驾驶班长一点儿也不敢含糊,紧紧咬住前面的车不放。前面出现一条岔道,车灯前的车影一消失,他马上加足油门赶上去。但是出现在眼前的不是炮车,而是营部的一辆“嘎斯”通信车。他正欲冲过去,通信车突然横在路中,驾驶班长一个急刹车,嘴里骂骂咧咧地跳下车,准备训斥通信车驾驶员一顿,只见教导员下了车,手捂下腹走来:“驾驶班长,你们车上有唐山籍的兵吗?”“有!”驾驶班长扶教导员过来。“那好!”教导员痛苦的神情稍有缓解:“请他带我到机场救灾医院去,其他同志上‘嘎斯’车,我的阑尾炎病犯了。快!顺便代我向政委请几小时假!”

教导员身高1.81米,个头瘦长,典型的农家子弟。别看他家境贫寒,但聪颖过人。他19岁考入外语学院,会说俄、日、英三国语言,写得一手好字,原创格律诗词略加沉思就能脱口吟出,体育运动篮球也打得好!1965年,他作为调干生,投笔从戎,到部队担任外语干事。由于他德才兼备又具鲜明的个性和主见,入伍9年就升职为营教导员。

教导员有个特点,能将复杂的理用简单的比喻说得通俗易懂。我们在新兵连,听他讲过一次话。教导员说:“从老百姓到军人是人生的一大转折。作为人民军队的一员,我们必须切记是人民养活我们的!现在我们每一位军人是由中国五个含辛茹苦的农民养活的!我们打出的每一发子弹是一个农民一天的口粮,每一发炮弹就是一户农民一年的口粮。所以,作为新战友,你们在军训中要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当兵为什么?就是保家卫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人民军队的宗旨!将来天下太平了,消灭了战争,和平永驻,我们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做到自给有余,反哺于人民,那将是革命军人最美好的理想和奋斗目标!”

啊,讲得太好了!我们情不自禁地给教导员起了个雅号:“养活学教导员!”

就在地震前的一个月,我们部队帮助驻地群众抗洪。抗洪结束后,地方干部为了感谢部队,军民进行了一场篮球对抗赛。在篮球场上,教导员身先士卒,带球快跑一跃投篮命中,赛场周围掌声一片。

2. 胜利会师

红军开始长征之后,相当一段时期由于形势复杂多变,并没有很快就确定自己的长征路线,也谈不上早已制定出长征目的地即终点的位置。到了1935年9月,俄界会议虽提出陕北、甘东是长征的必经之地,但也并未说明它就是终点。因为当时还提出要打到靠近苏联的边界去,况且当时红军还不知道陕北已有相当力量和范围的红军和苏区的存在,当然也就不可能作出选择长征的终点的决策了。最后让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作出红军长征目的地,即终点的决策这一历史契机的,是1935年9月16日红军攻占了川甘边界的重大关隘腊子口,并于18日到达哈达铺之后。

腊子口是四川通往甘肃的通道,也是当时红军北上的一个重要通道和天险。随即红军乘胜攻占了哈达铺,红军在缴获了大批军粮、公盐之后,又意外地获得了一些国民党地区的报纸,其中有《大公报》《山西日报》。正是这两家报纸,让毛泽东、张闻天和党中央作出判断,把红军长征的目的地放在了陕北。

关于这件事,后来一些长征的经历者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如彭德怀在其《自述》中说:“在哈达铺休息了四五天,从报纸上看到陕北有刘志丹苏区根据地,很高兴。”聂荣臻也在回忆录中称:“9月19日,我和林彪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我们得到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的消息。我说,赶紧派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同志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张闻天阅读的是《大公报》。其中,7月23日阎锡山的讲话、29日的社论《论陕乱》及8月1日的有关报道等,引起了张闻天的极大关注。毛泽东得到这一喜讯极为兴奋,立即在红军团以上干部大会上,宣布红军前进的方向是刘志丹等红军所在的陕北。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先后进行了战略大转移。红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克服雪山草地的险阻,经受饥寒伤病的折磨,战胜张国焘机会主义党内分裂的危机,终于胜利完成

们的画。后印象派画家卡米耶·皮萨罗就回忆道:德加在帮助那些缺钱的艺术家的如此善意和细心。他帮过高更,在展览上买他的画。还有几位纳比派画家,像莫里斯·德尼、保罗·塞律西埃、皮埃尔·伯纳德和爱德华·维亚尔,他也像对高更一样待他们。画家之间有互换作品的习惯。德加藏画部分,有几幅就是如此得来,像那张印象派女画家玛丽·卡萨特的《梳头的女孩》,是他在1886年第八届印象派画展上,用自己一张色粉画——《盆中洗浴的女人》换来的。

德加和巴黎很多艺术经纪商关系不错,也因此便利,用自己的画作去交换他们手里的其他名画而无需偿付现金,通常是估算一个价格,然后留下自己几幅价值相当的作品。1895年,他从经纪商蒙特涅克手里取走一幅德拉克罗瓦的肖像画《史温特男爵》,交换条件是他自己的三幅色粉画,总估价1.2万法郎。另外他还有两幅重要收藏——马奈《抱猫的女人》,以及曾被禁开展出的《处决马西米连诺皇帝》的残片,都是自己作品换来的。名作《处决马西米连诺皇帝》有油画和石版画三个版本,其中油画在马奈去世后不知下落。德加想要把好友的这幅画重新合体,他让经纪商沃拉尔帮他找到两段残片,是原画面的中央部分和左下方的马西米连诺的下半截身子,并说服对方四处打听,又找回另外两小段。我们现在伦敦国家画廊看到的大画由四块拼接,画面中央几个持枪的士兵群像基本接近完整。

从以上画作的购藏时间可以看到,德加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简直就是巴黎艺术市场的疯狂买家。他的雕塑家朋友阿尔伯特·巴索罗姆在给另一朋友的信中写道:“德加一直在……买,买。每天晚上他都自问该如何为白天买的那些东西付账单,可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又开始了。”大家都听说了德加的癖好,开始在拍卖中和他抬价,因为大家知道:如果德加看上了什么,他会不惜代价要得到。

跨越十几个省、总行程达数万里的长征。长征的胜利,成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虽然失去了南方原有的根据地,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力量,但是保存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骨干,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正当抗日战争的烽火即将在全国燃烧起来的时候,三支主力红军为担负中国革命的新任务而在西北会师,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然而,按照传统的说法,似乎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国革命就像大海的巨浪一样,一浪高过一浪,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直至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针对这一美好想象,我们如果循着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地看中国革命的曲折道路,那么就不能将悲怆、壮丽的革命看做儿戏,否则革命太容易成功了;而要还其历史的真面目,从而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辉煌局面。

其中,红军到达陕北后,匆匆组成西征部队,乃至使西路军全军覆没的悲壮历史,既是红军长征的尾声,也是中国革命多重面像的一幕悲剧。

在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史上,红军西路军的失败是一个长期以来困惑人们的悬谜,其不仅失败之惨烈,诚如徐向前元帅所云,西路军两万多人,遭到几乎全军覆没的命运,在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回顾这段历史,确有“不堪回首话当年”之叹。更有西路军出征,究竟是谁作出的决策,一直是尘封的不能碰的史学研究禁区。而史学界一贯的看法,则是西路军的失败,是按张国焘的擅自命令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向西逃跑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史学研究领域贯彻党的实事求是路线,以及共产国际、中共党史相关档案的解密,特别是一些西路军高层幸存者的回忆,终于使西路军真相大白。

红军长征胜利后组军西征,是笼罩着神秘色彩的历史事件。如果说西路军出征的决策属于高度机密,当时的西路军普通官兵不可能知道内幕的话,那么西路军的高层干部,甚至也无从知晓其决策内幕,其中典型的有时任西路军30军代理军长的程世才。

西路军幸存者回忆录



秦维宪